

上海市社会科学
博士文库

● 刘世军 著

近代中国

政治文明转型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644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D092.5
L74

近代中国 政治文明转型研究

刘世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刘世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11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ISBN 7-309-02611-X

I. 近… II. 刘… III. 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807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江苏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1

字数 198 千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 导 论

0.1 提出问题

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1840—1919）。

一般而言，学术界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称为中国的近代，本书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这一时段中进行。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获得了对历史诠释的价值。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着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所以“历史不重演”^① 的说法只是一半真理。尽管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近代不可同日而语，但现代化的难题与困境却与近代有惊人的相似，甚至就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如果把上个世纪末看作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社会转型的发端，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只能是过去的延续和升华。

近年来，国内外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都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问题的同质性，二是问题的相续性。所谓同质性是指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境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 30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与近代中国相比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中西之争问题,发展模式问题,古今之辨问题等等,所谓相续性是就问题的前后贯通和源流归一而言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问题是近代就发生并一贯演化而来,诸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社会转型问题、“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①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同质性和相续性,才使当代学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近代意识和近代情结,以至于在这方面的研究经久不衰,蓬勃繁荣,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其研究领域之广博,研究方法之多样,研究成果之浩繁都令人叹为观止,形成了近代中国问题的历史学解答、哲学解答、政治学解答、社会学解答、文化学解答以及人类学解答等多学科研究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观。然而,就政治学一科而论,在这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解答和研究视界都处于起步阶段,这不能不是政治学界的憾事。

其实,近代政治文明的转型或曰中国传统政治的近代化、现代化这一论题理应引起政治学研究的重视。就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陈旭麓先生称之为新陈代谢)而言,其变革最巨者当属政治。如果把社会看作是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统一体的话,政治也是甚为显眼的部分,所以忽视了政治文明的转型就是丢弃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主干。

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是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乐,其主题是围绕政治核心而展开的。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主旋律,事实上,这一旋

^① 林毓生:所谓创造性转化,简单地讲,是把中国文化传统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291页,三联书店1996年。

律又是由两条线索组成的：一条是显现的，一条是被遮蔽了的，前者表现为轰轰烈烈的政治结构的解体与重组，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后者却是隐藏在政治变革里层的政治理念、政治哲学、政治话语等观念形态的流变。

一般而论，体制与观念间是互动的关系，不应相互剥离，但这一关系在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却发生了变异，熊月之先生称之为近代中国民主化的一条有别与欧洲的特殊逻辑。从普遍意义上说，欧洲民主化遵循的是由“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而中国的民主化“则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自由平等这样一条恰好与欧洲相反的逻辑”。^①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观念与体制相互剥离，制度与制度之精神互相排斥，致使宪政变作了镜花水月，帝制颠覆了共和，军阀专制代替了政党政治。君权被打消，民权却未见勃兴，人治被批判，法治却并未建立，权威观念不断消解，权利意识却并未增长，全能政治被唾弃，有限政府却少有发展，所有这一切又构成了近代政治文明转型中的二律背反，如何解答这一二律背反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人的一块撕心裂胆的心病，也是本书企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并枉自称其为政治变迁中的哲学问题。具体而言，这一问题主要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制度移植的辩证关系，文化与制度的辩证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地理环境之辩证关系。

为什么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难以移植在中国？为什么帝制能颠覆共和？中国的政治文明转型究竟应走渐进式的改良主义道路

①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1页。

还是激进式的法兰西道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为什么会出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惨烈局势？中国古老的政治文明如何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而焕发出新的生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作政治学的深刻反思。

德国哲学大师谢林教授曾言：“从纯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中华帝国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古老的帝国。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显示了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中国虽然两次被征服，可是它的宗法制度、道德、习俗、国家机构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从其内涵来说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四千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①

每每读到这一段文字，都会令人心绪振荡，茫然无措。是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而不衰的奇迹所忘情呢？还是为其保守封闭而导发的多灾多难而悲叹呢？历史不允许我们做诗人般的垂泪凭吊。当中华帝国第三次被征服时，它再也没有往日贵族般的孤芳自傲了，同时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延续其陈旧的宗法道德、习俗机制和生活准则，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②

这种变迁是全方位的，也是长时段的，它构成了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正是这一前所未有之变局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制约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所以这一问题成为了学界的一个不老论题。

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是被文明人用极其野蛮的方式揭开的。“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

①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柳卸林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② 李鸿章语，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

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①，“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着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 清王朝或曰中华帝国的体系正是这一解体的木乃伊。所以，整个近代中国史又是一部旧体制被打碎，新制度不断建制，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规范不断式微，新的生活景观和道德秩序不断形成的社会新陈代谢史，而这一新陈代谢的主题始终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核心展开。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主题的凸显是由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催生的。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始，中国便陷入了割地赔款、丧权失土的历史沼泽地，至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这是学界的定论。失败由衰弱而致，衰弱由贫穷引发，所以“求富”、“求强”便成了洗雪国耻、重整河山的重要方略，而如何求富求强呢？“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③。所以就有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全盘西化等强国御侮的一系列主张。

这些主张都是在一片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提出的，其中不乏有历史无奈和历史真实的一面。但不管我们如何在情感上不愿接受，向西方人学习，西学东渐已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一道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3 页。

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9 年，第 1359 页。

眼的风景线。西学东渐是把西方文明作为工具理性而崇尚并拿来为我所用的,由此也就决定了这一运动的实用主义色彩。

西学东渐是一个由“器物”到“政治”,再到“文化”的过程。西方人最初令中国人钦羡不已的是他们的“奇技淫巧”、“声光化电”之类的先进器物,所以向西方学习首先从器物层面开始。于是便掀起了以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后来也有部分民用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以求实业和商务救国。但洋务派的主张和努力一遇甲午的炮火便如瞬间春梦,灰飞烟灭。自此政治救国论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政治救国也逐渐演变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景观。

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是寻求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且是企图通过移植西方政治文明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单从这一“企图”我们便可知其方法论之大谬。历史证明,这种“企图”只能是浪漫主义式的空想,其破灭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等于说破灭就毫无意义可言,相反,这一政治浪漫主义的破灭过程同时也是政治文明的转型过程。以破灭为线索来研究其转型正是本书的旨趣所在。

0.2 核心概念

● 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曾谈及^①,但并未细作说明,目前

^① 马克思曾谈到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38页。

在政治学界仍未对其内涵作详细界定。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斯特洛姆(Vicent Ostrom)教授曾写过一篇以“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为题的论文,但他只是含糊其辞地作过“东西方文明”、“基督教传统体制”、“儒教文明”等描述^①,显然是把政治文明停留在汤因比的文明和文化的解释上。^②

文明同文化一样,是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但又很难形成定论的一个概念,据说曾下过的定义不下几十种,所以要查明其细目,理清其端绪,实非易事,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一一厘清其本源。

概而论之,就文明与文化之关系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明与文化如影之相随,分野甚微,如汤因比、斯宾格勒等史学大师^③;另一种却认为文明与文化两者不能等同,这一点在哲学大师钱穆那里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文明偏在外,属于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于精神方面。”^④这一解释似乎有些离谱,从简单的二分法角度就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别。总而言之,按不同标准会有不同的文明分类,这不是本书涉及的重要内容,所

① 奥斯特洛姆认为:“最近五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崛起与建立帝国的冲突密切相关”,在未来十年里,我们从何处着手为秩序的构造奠基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从我们各自文明的基本思想渊源入手。见《经济民主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第269页。

② 汤因比:“我们所说的文明意思十分清楚,在试图确立定义以前,我首先想说,人类被分成西方文明、远东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这些不同的文明使我联想起在宗教、建筑、绘画、习俗等方面各不相同的表象”,“我们说的文明是指人们在试图认识本国历史时使用的最小研究单位。”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38、139页。

③ 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束……它们是一种总结,不可挽回,但因为内在需要,一再被达到”。见〔德〕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4页。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第1页。

以,我们将此搁置一边,不再赘述。

为什么用政治文明代替政治文化,这是会引起许多人诘难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的就是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分野。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与行为主义政治学革命相伴而来并主要以分析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为主旨,所以,这一概念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单纯从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层面分析政治现象的狭隘领域,特别在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政治冷漠以及投票行为、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等微观政治研究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所以,政治文化也就作为一个内涵明确的分析工具被政治学界普遍接受并广泛应用,而且基本上都是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G·A·阿尔蒙德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这一概念的^①。“显然这一概念关注的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即政治主体的潜在的、不成文的隐性心理取向,而不是政治思想、政治体制等显性的文化,所以用这一概念来描述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是不够准确的。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的嬗变来说,其中心理取向的变化是明显的,但远非问题的全部。而且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政治结构、政治功能、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哲学以及政治话语等显性文化的嬗变,大大超越了政治文化所表达的含义。为了不致引起误读与歧见,本书用政治文明来代替政治文化。其含义自然包括体制和观念两个层面,即体制文明与观念文明。

中国政治学者认为,政治文明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治文明是由国家构成的社会活动的产物,

^① G·A·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见《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第 29 页。

最终是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政治文明的内容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其中国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的程度不断提高。^①

● 政治文明转型

政治文明在本书中是在两个大的层面上来使用的,一是体制或曰制度层面,二是思想或曰观念层面。就制度层面来说,并非指现在学术界炙手可热的制度学派或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②,而是指狭义的政治结构、行政结构等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所以,本书论及的政治文明的转型就具体表现为政治结构、政治功能、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政治话语体系以及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转型。当然,其中也包含政治心理的变迁。

推动政治文明转型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近代中国具体表现为封建专制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所以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转型的环境与其他政治体系相比,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其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504—505页。

②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固定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权力与财富原则”,或曰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8—141页;〔美〕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2页。

中,西方政治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重要外部资源,本书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来研究的。

0.3 基本观点

本书对政治文明转型的研究是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背景而展开的,所以政治文明转型的演化路径始终围绕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而行进。“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国人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在政治领域,这一问题就演变为中国政治向何处去或曰传统政治文明如何创造性转化来应付变化了的时局之问题。

从思想史的流变来考察近代政治史,我们发现近代国人是把政治作为工具理性来思考的。换言之,政治总是以救亡图存、强国御侮,“扶大厦之将倾,拯斯民于水火”之面目出现,而这一政治工具又是从西方借来为我所用的。这种政治的工具色彩决定了政治救亡命运的破灭,但破灭与政治文明的转型又是同时进行的,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出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 西方政治文明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一面镜子

西方政治学东渐是近代政治浪漫主义的发端,同时也是政治文明转型的开始。在西方强大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所作的最深刻反思是学习西方,回应西方;在认识到西方之强大实非兵器,而是政治时,便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政治文明,企图用西人之政制来救中国之落后,所以,以西方进化论为指针的政治观成为新政治理论的基石,政治学也成为了时代之显学。这一学习西方政治、

引进西方政治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向传统政治宣战、反抗传统政治和背叛传统政治的过程,而在这一新与旧、中与西的激烈震荡中,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型。

● 体制与思潮互动是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基本图式

反观近代中国,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逐渐丧失其法统地位,西方各种思潮和近代观念潮起潮涌。其中尤以进化论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等为甚,一种完全异质的政治文化冲垮了秉承“天命的”王朝观念。在西方政治思潮的示范、刺激之下,政治实践领域的变革此起彼伏。其中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构成了制度层面变革的三大高潮,观念的变革充当了制度变革的先导,制度变革又促发了思潮丛生,二者的互动是近代政治转型的基本图式。

● 西方政治学充当了瓦解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工具

传统之稳定性决定了一种文明在没有外来挑战的情况下,其变革是缓慢而微弱的。促使传统瓦解和变迁有两种因素:一为内在的因素,一为外在的因素。就外在因素而论,它之所以能促使本土传统的嬗变与解体,归因于它明显的优越性。“当两种一向独立的传统发生杂烩,其结果是某一组传统胜过了另一组,并在先前并不知晓这种传统的社会中获得了新的拥护者”^①。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方政治传统是陌生而新奇的。但它在中国的渗透与传播直接刺激了古老帝国的传统,当西方文明以咄

^① [美] 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324 页。

咄逼人之势击败天朝之文化精神时,便在中国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信徒,而这批人正是为欧风美雨所折服,并把西方政治文明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会新生力量。他们用近世的民族观念向传统的天下观念挑战,用议会制向专制结构发难,用选举制来攻击世袭制度,用民主意识来消解民本观念,用权利思想来反抗权威之法统,用法治来反对人治,用进化论和法学政治观来对抗循环论和伦理政治观。尽管西方政治文明像浪漫主义一样在这一场移植与对抗过程中惨遭破灭。但它同时又如同一把锋利的剃刀修剪了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动摇了其根基,并促使其开始了长期而艰难的创造性转变历程。

● “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转型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①,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谋求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发展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后来的“全盘西化”、“文化论战”等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论争,“体用不二”还是“体用分离”是问题的焦点。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孕育出西方式的政治文明,或言西方政治文明能否脱离其母体而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这在近代文化史上称之为发展阶段和发展路向之争。一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导致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只不过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而已。另一方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能产生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正

^①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

是这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使其在激进与渐进、进步与倒退、改革与保守之间艰难行进。

0.4 基本问题与方法

本书是以近代中国的政治革新为线索分五部分来论述西方政治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的。西方政治学是作为救亡强国的工具被引入的,是近代国人寻求中国问题政治解决的一种努力,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它是一股政治浪漫主义思潮,而且最终走向了破灭,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实际上这一破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走向解体并逐渐转型的过程。在此期间,西方政治文明起到了刺激、瓦解和示范的作用,并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体制外催化剂。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笔者始终坚持认为,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显然,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内在动力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矛盾。

由于本书主要企图探求的是西方政治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之间的关系,所以并未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其转型的根本动力上,这是有必要在此说明的。

本书第一章是对西方政治学东渐的历史分析。分别从西方政治学东渐的动力机制、障碍因素、历史过程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西方政治学的东渐过程以及成为近代中国显学的过程,并对引进的西方政治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书认为文化与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与“回应”^①是西方政治学东渐的根本动力机制。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过程就是政治学东渐并成为显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问题政治解决的开始,并因此而成为中国政治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开始。

第二章主要论述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目标模式。本书以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为主线,阐述西方政治文明与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在目标模式上是对西方政府体制的模仿,所以,首先对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府原理进行了理论解剖,将近代西方政府体制的政治学基础概括

^①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表述就是挑战与应战,他说,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与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挑战大体有两种类型,即人为的和自然的。人为挑战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一文明内部,这种挑战全是属于关系内部发生的,以发生差异开始,而以脱离告终。变化是在原有的文明内部发生的,发生在这个文明开始丧失创造力的时候;在它的生长时期,这种力量曾使它在表面之下或界限之外,在人们的内心里引起一种自愿的归附心理。可是到了它丧失这种力量的时候,这个害了病的文明便会因为它丧失了生命力而付出重大代价;它会分解为少数统治者和无产者两大部分。这些少数统治者已经无力进行领导,只能依靠加强压迫;而无产者们对这种挑战的应战办法便是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量,而决心使他们的精神觉醒。人为挑战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文明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另外,汤氏认为,几乎所有的文明都遇到过自然环境的挑战。无论是两河流域的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文明,都概莫能外。见《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3—98页。